

西加女英烈宋竹清 (下)



坤甸德育女校部分师生合影
(1940年4月4日)



宋竹清校长 (左一) 与老师们并肩漫步
在林荫道上。

后来她在家里开了补习班，为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讲授中文、算术等课程。她热爱祖国和关爱、教育后代，在逆境中坚持传承中华文化的义举，使她成了日军占领当局的黑名单人物。

1944年3月25日清晨，日本特警队头目冈田带领一伙军警搜捕宋竹清校长，同年6月英勇就义，终年42岁。宋竹清校长的儿子凌彬晚年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道：“当时我还年幼，却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上，妈妈带着我在厨房里淘米、洗菜，准备做午饭。突然听见附近有人高喊“日

本兵来抓人了”。过了片刻，3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家，翻箱倒柜，搜拿照片、信件和纪念品，摔碎许多茶杯和盘碗，这时妈妈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让我立即从后门逃往亲戚家躲起来。接着，她被日本鬼押走了。在途经附近的咖啡店时，妈妈寻机请店主阿婶转告外婆：“孩子们长大后，一定要回唐山(祖国)去！”宋竹清校长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交代后人日后回国，她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令后人感叹不已。

值得庆幸的是，宋宋竹清校长的夫君

凌瑞拱(注3)和长子凌彰已隐居邦加岛，次子凌彤也在坤甸远郊的淡巴央港避难，因此躲过了灭门之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坤甸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怀着无比沉痛和哀伤的心情怀念惨遭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的避难同胞。当年的10月27日，坤甸各界代表和避难同胞遗属百余人在中华公会会长黄业良、黄锦安等侨领的带领下，在东万律“万人坑”举行隆重肃穆的悼念仪式，沉痛哀悼避难同胞，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随行的《黎明报》特派记者、社长许行先生当日撰写了一篇报道《西婆罗洲血史一页》，代表了西加里曼丹罹难家属的心声，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罪行，严正要求国际社会严惩日军大屠杀凶犯。

血债必须用血来偿，在西加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46年，驻守坤甸的盟军军事法庭公开判处“坤甸大屠杀”首恶山本、宫岛和伊东等十余名日本战犯以及汉奸林木盛等人死刑，当场执行处决。

日本投降后，坤甸中华公会等侨团和各界人士，遵照宋竹清校长的遗愿，于1947年协助她的长子凌彰、次子凌彤回国升

学；三子凌彬也于1954年振强中学初中毕业后，回到北京读书。他们回国后，在祖国的关怀和培育下，以及自身的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终于成为国家的高端人才。凌彰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长期从事东南亚文学的研究和编译、撰稿，著作等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副主任，研究员。凌彤毕业于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是国内外著名的骨科医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医学论著蜚声国内外。三子凌彬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修完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的课程)，曾任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司副司长，高级经济师。兄弟三人继承先人的爱国精神，实现先人的遗愿，为祖国的腾飞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注1：当年坤甸华人，称呼学校老师不分男女均尊称为“先生”。

注2：罗叔章(1899-1992)，女，原籍湖南岳阳。早年

先后到荷属东印度婆罗洲岛(今印尼加里曼丹岛)、爪哇岛等地华侨学校任教。回国后，于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以及工商界、妇女界的抗日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后，历任中央劳动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副部长。五、六十年代，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她先后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解放前以及解放后，她长期协助宋庆龄和宋庆龄基金会开展有关工作。罗叔章一直独身。无子女，却引导、培育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她生前经常资助有困难的学生、亲友和同志，最后将全部积蓄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

(注3)凌瑞拱先生于日本投降后，由印尼邦加回国，初在南京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执教，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东方系教授。(完)

黄新聪



从左到右：凌彰，凌彤，凌彬